

唐山過臺灣一

<<遇見 300 年前的臺灣—裨海紀遊>>讀後感

◆ 方竟曉

一、前言

位於西太平洋島鏈中央的臺灣，我們賴以生存的寶島，在可信的紀錄上算是出現相當晚的。自公元 1544 年葡萄牙海船由臺灣東岸經過，因驚艷而命名為「Formosa」（福爾摩沙）後，西方世界才漸漸曉得有這麼個島，迄今不過四百多年而已。歐美諸國距臺萬里，這麼晚才知有此地不足為奇。然而，與臺灣僅僅一線之隔，自詡為天朝大國的海峽對岸中國人呢？數千年來，中國人對於這個東南島嶼的印象一向相當模糊，無不認為是文教不及、皇恩不沐之荊蠻野荒彈丸之地。自秦漢以來，航海技術雖益趨發達，臻至明朝鄭和下西洋宣揚國威的波瀾壯闊創舉，卻對臺灣這塊孤懸海外的化外之地沒有多大的興趣，儘管歷代或多或少留下了一些記述，但多半語焉不詳，甚至蒙上一層神秘的色彩。上述情形，一直到清朝統治臺灣以後，一位師爺奉命來臺公幹之後，情況才算有了轉變。

郁永河字滄浪，浙江杭州府附郭仁和縣人，擔任福州府同知王仲千的幕賓。清康熙 36 年（公元 1697 年）1 月，郁氏渡過險惡的黑水溝（臺灣海峽），到當時人人聞之喪膽的北臺灣淡水、北投一帶採集硫磺礦，以賠補前一年他所任職的福州府軍火庫大火的損失。郁氏在今日的臺南登陸，以牛車代步，風塵僕僕穿過臺灣西部縱貫線的一大半，沿路經過二十七個原住民部落，越過九十六條大小溪流。扣掉因為大甲溪暴漲而被耽擱的時間，他總共只花了十天的時間，就從臺南抵達淡水河邊。採硫任務結束，郁永河直接從淡水開航返回福州復命，返家後著成《裨海紀遊》一書。

在彼時臺灣初入版圖，多數清國官吏只想龜縮在臺南府城辦公，視基隆、淡水為有去無回的瘴癘絕域，非不得已絕不踏出府城的惜命心態下；在當時臺灣住民一包括平埔族、他族原住民及少數的漢人新住民，尚未系統性地以文字記錄的時代下，

《裨海記遊》除作為郁永河來臺採硫的日記和遊記之外，最大的貢獻就是留下了十七世紀末臺灣南北通道的地理景觀、人文歷史的文獻，曾經滄海桑田、時過境遷下急遽改變的人文景觀，因為這本遊記，我們得以真實的感受到三百年前的臺灣原始風貌。

二、《裨海紀遊》之我見

《裨海紀遊》全書分三卷，共二萬四千多字。行文夾敘夾議，另雜以吟詠。閱讀完本書，茲將個人感想臚列如下：

(1)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—當作者於臺灣府城籌備採礦事宜告一段落後，臺灣知府、同知等官員咸勸作者：「吾不聞雞籠、淡水水土之惡乎？人至即病，病輒死。」希望他愛惜生命，「曷令僕役往，君留郡城遙制之何如？」作者堅持受人之託忠人之事，不顧瘴癘險阻重重的忠告，堅持率隊走陸路北上，同時亦為了達成遊歷臺灣這塊處女地的心願。

然郁永河的煉硫過程並不順利，他以「在在危機、刻刻死亡」、「久處危亡之地」來形容在這裡的生活。剛到達目的地的夜晚，即驚傳工寮外射來一箭，穿透了捕魚人枕邊 28 層的布，接著又一箭貫穿其手臂的攻擊事件，後來，隨行人員幾乎病倒或甚至病死。又遇到颱風，茅舍被風吹倒，煉硫鍋爐也受損壞。替補工匠也發生到任即病倒的現象，直到秋涼天氣，煉硫才比較順利進行。即便面臨如斯困境，作者依舊不改其志，曰：「探奇攬勝者，毋畏惡趣；遊不險不奇，趣不惡不快。」充分顯露了他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冒險精神。

(2)反映臺灣開發概況—當時的臺南、嘉義一帶經荷蘭、鄭成功政權多年屯墾，大體上已適宜以農業為主的漢人居住，但其他地區則不然。彰化地區「林莽荒穢，宿草沒肩，與半線以下如各天」；臺中附近是「野番常伏林中射鹿，見人則矢鏃立至，慎毋往」；新竹桃園一帶「自竹塹迄南崁八九十里，不見一人一屋，求一樹就蔭不得」、「直狐貉之窟，非人類所宜至也」，且「山中野牛甚多，每出千百為群」；花東地區是「苦野番間阻，不得與山西通」；中央山脈是「自洪荒以來，斧斤所未入，野番生其中，巢居穴處，血飲毛茹者，種類實繁」，而其目的地淡水地區更是



「水土害人」、「凡隸役聞雞籠、淡水之遣，皆歎歎悲嘆，如使絕域；水師例春秋更戍，以得生還為幸」。而由他所作的《臺灣竹枝詞》：「臺灣西向俯汪洋，東望層巒千里長；一片平沙皆沃土，誰為長慮教耕桑？」，在在明白的指出臺灣部分地區雖已粗具農業規模，基本上仍是個未開化及瘴癘之氣極重的地帶。

(3)對平埔族原住民的觀察—郁永河於同年 4 月 7 日自臺灣府城出發，中間經牛罵社(今臺中清水)的滯留、淡水社(今臺北淡水)的準備，於 4 月 27 日到達今天的北投，開始煉硫作業。其行經路線，穿越了許多平埔族群原住民的地域，郁氏雖然行色匆匆，途經的各社往往只是驅車而過，最多是暫宿即去，但一路都不斷觀察及記錄見聞。經由《裨海紀遊》，我們可以發現西拉雅(Siraiya，臺南四大社)、洪雅(Hoanya，倒咯國至大武郡社)、帕瀑拉(Papora，大肚、沙轆、牛罵三社)、巴布薩(Babuza，半線及啞東社)、道卡斯(Taokas，大甲至竹塹社)，以及凱達格蘭(Ketatangalan，南坎社以北)等各族之間的風俗、語言、習慣，甚至外貌原本差異極大，但如今卻物換星移，漢化消失殆盡，令人聞之不勝唏噓。

更令後人嘆服的是，僅僅二十日間，郁永河但憑驚鴻一瞥，就留下如此詳實的資料，進而造福後世，成為研究臺灣民族學與地理史的第一手、最具體的文獻，其觀察、敘述的功力之高，還比後期許多宦、寓居臺灣島多年的作者筆下描述的臺灣原住民景況還細膩詳確呢！

(4)人道主義者的胸懷—「乃以其異類且歧視之；見其無衣，曰：『是不知寒』；見其雨行露宿，曰：『彼不致疾』；見其負重馳遠，曰：『若本耐勞』。噫！若亦人也！其肢體皮骨，何莫非人？而云若是乎？馬不宿馳，牛無偏駕，否且致疾；牛馬且然，而況人乎？抑知彼苟多帛，亦重綈矣，寒胡為哉？彼苟無事，亦安居矣，暴露胡為哉？彼苟免力役，亦暇且逸矣，奔走負戴於社棍之室胡為哉？夫樂飽暖而苦飢寒，厭勞役而安逸豫，人之性也；異其人，何必異其性？仁人君子，知不吐余言。」

漢人往往因文化之優越感而歧視原住民。郁氏認為如果因原住民未開化而不認同他們，雖是理所當然之事，但不認同原住民，並不能去否定人與生俱來的秉性！人都是父母生的，誰會有衣服可穿而不去穿？假如能免去勞役，他們也可以過著安逸

的日子，為什麼要辛辛苦苦地背著東西送到社棍的家裏去？人的本性大都「厭勞役而安逸豫」，不論是漢人或原住民並無軒輊。

此外，對一些在原住民各社中負責翻譯、對外聯絡、仲介的夥長及通事，每藉原住民語言隔閡、不諳法令的弱點而巧取豪奪，中飽私囊的行為，他一再表示痛恨，認為「流毒無已」，稱這群「此輩皆內地犯法奸民，逃死匿身於辟遠無人之地，謀充夥長通事」的吸血鬼為「社棍」，不因同屬漢人而姑息養奸。由以上數端可以窺見，作者是個具有悲天憫人胸懷的人道主義者。

(5)稱頌鄭成功—《裨海紀遊》一書還記錄了一些有關鄭成功祖孫三代的傳聞，多有他書所未記載者。特別的是，作者大膽了提到鄭成功三字，而不另加偽鄭、鄭逆等字眼，相反地大膽的對其之德行及孤忠大節讚譽有加：「鄭成功年甫弱冠，招集新附，草創廈門，復奪臺灣，繼以童孺守位，三世相承，卒能保有其地，以歸順朝廷，成功之才略信有過人者。……而仍奉永曆之紀元，恪守將軍之位號，奉明寧靖王、魯王世子禮不衰，皆其美行。」

儘管距鄭氏滅亡不久，郁永河來臺的前一年，島上又剛發生過吳球、朱祐龍的謀亂事件，政治氣氛甚為敏感的當時，關於清領之前的鄭氏，不會因此而在記錄上有所顧忌、隱晦或有所偏離史實，在字裡行間反應出一種士人對士人惺惺相惜之情，這毋寧需要相當的道德勇氣。

(6)對臺灣的遠見—當時的大清，對於臺灣這塊土地，屢有棄卻之說，有議者謂：「海外丸泥，不足為中國加廣；裸體文身之番，不足與共守；日費天府金錢於無益，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。」郁永河卻不做如是觀，曰：「不知我棄之，人必取之；我能徙之，彼不難移民以實之。噫！計亦疏矣！」

擊潰鄭氏政權，將臺灣納入清廷版圖的靖海將軍施琅，就曾奏議《請留臺灣疏》，陳述臺灣之去留，去之害，留之益之論。如：「題為恭陳臺灣棄留之利害，仰害審裁事。竊照臺灣地方，北連吳會、南接粵嶠，延袤數千里，山川峻峭、港道紆迴，乃江、浙、閩、粵四省之左護…資皇上東南之保障，永絕邊海之禍患…然當此地方初闢，該地正賦、雜餉，殊宜蠲豁。見在一萬之兵食，權行全給；三年後開徵，可以佐需。抑且寓兵於農，亦能濟用，可以減省，無庸盡資內地之轉輸也。蓋籌

天下之形勢，必求萬全。臺灣一地雖屬外島，實關四省之要害。勿謂彼中耕種，尤能少資兵食，固當議留；即為不毛荒壤，必藉內地輓運，亦斷斷乎其不可棄！…伏乞皇上睿鑒，全覽施行！」郁氏更深謀遠慮、一針見血指出，大清朝之所以歷時長久，勞師動眾還不能剷滅鄭氏政權的原因，就是因為有臺灣作其根本。如今臺灣好不容易回歸中土，卻說應予放棄，那麼日本、荷蘭、安南等國必然會來佔領了，而這些國家之中，又以日本最有可能。果不幸為其所言中，在近二百年後的清光緒 21 年(公元 1895 年)，日本以戰勝國姿態，迫使中國簽下「馬關條約」，獲得了包括澎湖群島在內的臺灣新領地，展開了長達五十年的統治。

(7)歷險之後的心境—作者由抵臺初時的心懷憧憬：「況蓬萊在望，弱水可掬，藉令祖龍、漢武聞之，不將褰裳恐後乎？」，最後演變為「余向慕海外遊，謂弱水可掬、三山可即，今既目極蒼茫，足窮幽險，而所謂神仙者，不過裸體文身之類而已！」經歷了臺灣之行，作者赫然發現，原來傳說中的神仙，不過只是裸體紋身的原住民罷了！而所謂的蓬萊仙島，亦不如「吾鄉激濼空濛處蕭鼓畫船、雨奇晴好，足繫吾思也。」代表作者一種歷劫歸來、恍若隔世的心境，足見此行之艱辛。

三、結語

「裨海」一辭的典故出自《史記·孟子荀卿列傳》：「乃所謂九州也，於是有裨海環之。」司馬貞《索隱》曰：「裨海，小海也。」本書譯者認為，郁永河大概覺得在大清國一統之下，臺灣海峽只能算是宇內的小海，因而用為這部特殊遊記的書題。然小雖小矣，郁永河在本書中即已清楚點出臺灣的重要戰略地位。惟當時的主政者卻缺乏遠見，並無積極之作為建設臺灣這塊土地，直到公元 1885 年巡撫輔劉銘傳主政、公元 1887 年臺灣正式建省後，才開始邁入各種近代化的建設，可惜的是，隨著劉的卸任，臺灣的近代化建設也跟著人亡政息，曇花一現。

或許正是這種對臺灣這一塊食之無味、棄之可惜之雞肋心態，加速助長了日本的狼子野心。日本對臺灣的覬覦由來已久，早在公元 1874 年「牡丹社事件」前，日後分別擔任第一任臺灣總督和民政局長官的樺山資紀、水野遵，就已三度入臺展開諜報工作，如樺山資紀《台灣記事》、水野遵《台灣征番記》及上野專一《台灣視



察記》，他們的足跡深入島內各個角落，對地形地利、軍隊彈藥部署等軍情，原住民活動等民情，以及臺灣樟腦、茶葉、糖等產業商情，均有相當的認識。公元 1894 年，法軍進攻基隆、淡水，日本海軍派艦觀戰，並藉機偵查基隆砲臺的及火炮及防禦工事。甲午戰爭期間，日本參謀本部編纂的《臺灣誌》，更詳載臺灣的所有資料，包括人口、位置、面積、山川、港灣、氣候、物產、風俗、交通等，足見日本情報力蒐集的用心。相較之下，清廷對臺灣所下的功夫著實相形見絀；更令人諷刺的是，臺灣的「近代化」，卻是從日本統治時期所奠基發展的。郁永河若地下有知，想必亦會感嘆造化弄人。

《裨海紀遊》是郁永河的來臺採硫的見聞紀錄，雖是紀錄，亦不乏道聽途說，非其親耳所見，因此謬誤之處所在難免。《遇見三百年前的臺灣》是第一本《裨海紀遊》的完整白話文譯本，雖是譯本，譯者不僅追尋郁氏的足跡，從臺南的鹿耳門到北投的地熱谷，逐一比對並重溫當年那位「不避險阻」者的臺灣西岸大縱走，探訪臺灣三百年來的風土變遷；以嚴謹負責任的治學態度，引據有關古老地圖、學者研究作品，以及生物、化學、氣象、地質等學科專業知識，逐一考證《裨海紀遊》所載；輔之豐富靈活的文筆，加上詳盡的註解、豐富的照片與參考資料，是回顧三百年前臺灣開發史的優良佐參，也是身為臺灣人不可不讀的一本好書。

(本文作者為台北縣林口鄉麗園國小會計主任)